

看时代风潮如何塑造人心

——胡学文《有生》、叶弥《不老》对读 □唐婧

《有生》和《不老》，仅从书名看，特别像是同一个小说的上下部。《有生》，然后“不老”，一前一后，一实一虚，叙述着人类的古老梦想与现实追求。但果真这么看就误会了。其实，这两部长篇出自一北一南两位作家（来自塞北坝上草原的胡学文和来自苏州的叶弥），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分别于2021年和2022年出版。《有生》和《不老》，这两部小说均以女性为主人公，探讨了我们会曾经遇到、今天仍要面对的种种问题：生死、爱欲、生活的意义。此外，两部小说在创作上也都追问式地融合了历史意识、时代精神和性别视角，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或庞大的时代语境或细小而促人深思的时代切片，构建出一幅描绘时代风云变幻中普通人生活状态和生命姿态的世情画卷。

《有生》全书近60万字，分为20个章节，作家胡学文用他自创的“伞状”叙事结构，以塞北坝上草原为地理坐标，以一位百岁老人奶奶乔大梅为主要叙述人，讲述了一个时间跨度上百年的故事。小说起始于主人公奶奶躺在床上的回忆，也意味深长地结束于奶奶乔大梅的回忆，几十人的生动故事，在奶奶一天一夜的讲述里，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叶弥的《不老》则以1978年末的江南小城吴郭市为故事发生地，讲述了一段发生在25天内的爱情故事，塑造了一位流光溢彩的女性形象——孔燕妮，展现了一个风起云涌、充满激荡的大时代里的众生相。

让故事自然生长

作者胡学文与叶弥都是才华横溢的小说家，是创造故事的高手。他们两人也均有过“触电”经历，胡学文的中篇《从正午开始的黄昏》，被改编为陈建斌导演的电影《一个勺子》，中篇《大风起兮》被改编为范伟、马伊琍主演的电影《跟踪孔令学》，中篇《婚姻六位》由冯巩导演拍摄成电影《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叶弥的中篇《天鹅绒》，则被姜文改编成电影《太阳照常升起》而轰动一时。不知是否跟有过“触电”经历有关，两位作家都擅用图像化叙事建构小说故事和塑造人物。正因如此，大部分读者阅读两部小说时，感受顺畅而愉悦，两部作品中我们很难找到为形式探索、增加噱头而牺牲叙事流畅性的地方，更没有刻意为之的游荡性情情节和桥段。

上下两卷、近60万字的《有生》读下来，作者的耐心和朴拙的叙事态度异常动人，《有生》从始至终，从生活的可能去散开故事，尊重故事情节，自然生长，如花、毛根、罗包、北风、喜鹊等，是除奶奶外另外10个章节的名字，这5个人也是小说中仅次于奶奶的重要人物。但在小说中，对这些主要人物的故事并没有给出定论，他们的命运被置入某种可能中，直到小说结束都没有终结，似乎一切仍处在不可预定的发展中。比如奶奶乔大梅的第二任丈夫白礼成和白花去了哪里？如花有没有同意置换坟包山上的地？毛根与宋慧的感情结局如何？罗包是否顺利与麦香离婚并与

传统文化与现代人的关系，值得一再讨论和阐述。对于传统的态度，常常会出现两派：一派自觉地靠拢，欲从古典中寻求一种缺失的美与力量，帮助自己更从容地生活在现代社会中；一派对传统依然隔膜，采取观望或回避的态度，认为它与现实离得太过远，如闲云野鹤，高深莫测。不管属于哪一派，不可否认的是，现代人和传统文化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盘根错节的亲缘关系，有时像熟悉的陌生人，视而不见，无伤大雅；有时不期然的一次相遇，让人倍感亲切，思绪万千。但如果是一次深度的相遇，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就殊为难得。置身在信息经济时代，人们占有信息的欲望和需求无限扩张，相应地，在每一个信息点上停留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人和人之间、人和物之间、人和传统文化之间，任何一次深度的相遇，都变得稀薄，也变得珍贵。

“未完成”的生命思索与人间真实

阅读郭平的小说《广陵散》就是与古琴的一次深度而恒久的相遇。关于古琴，大部分人生生活在琴人世界之外，很少有人会说自己喜欢古琴、听得懂古琴，但它可以轻易地用独特的音色唤起中国人的灵魂，可谓真正的中国乐器。因为古老，琴像有不生不灭、不奏自鸣的灵魂，因而往往忽略了和古琴密切相关的人和他们的活生生的世界。

现代以来，琴人不再由艰难求生的底层艺人组成，而是艺术家、职业演奏者、教师，是一类我们认知范畴里的从业者，但他们一定是和我们不一样的——终于面对陶渊明时代流传至今的乐器和文化，从事少有人了解和理解的冷门艺术事业，终究难免曲高和寡的遗憾。即使是天性平和冲淡、为琴所生的小说主人公周明，也会在失意时感受到古琴难以慰藉内心之：在一段恋爱失败后，他“长时间地盘桓于那些纷乱的心绪之中”。古琴成了他生活中极重要的内容，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然而这部分内容又是多么虚设脆弱啊。这是琴人的当代境遇之一，也应和了很多人追求挚爱事业的路途上彷徨与孤独的心声。由此，古琴在小说中也具有了一种更广阔的象征意味。但小说探讨的核心显然不是古琴艺术或琴人内心的“失落”，而是笼罩在艺术和理想之上的世界，那就是聚集着万千人生滋味的“生活”。

小说里另一位浓墨重彩的主人公徐大可，不断讲述着什么是他眼中扎实过硬的生活，什么是人应当追求的理想。这个牵动读者内心的人物，如熊熊烈火般燃烧着生命里的光和热——全身心地劝说朋友周明投入世俗、认知世界；以农民



安敏结合？北风和养蜂女的案子是怎么破的？一部如此篇幅的长篇小说，没有对任何一个重要人物的命运做出明确交待，这是《有生》的独特之处，也是作家胡学文对小说艺术的理解。

而在《不老》中，也有一个贯穿全书的未完成事件——“青云岛的宴请”。小说从一开始，为了迎接张风毅的出狱，倒计时25天，孔燕妮就计划在青云岛摆上几桌宴席。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她不断邀请吴郭形形色色的人物到青云岛赴宴。但直到这部小说结束，读者都不知道有多少人答应赴宴、孔燕妮张罗的这个宴席有没有在青云岛如期开办，宴请之事成了全书的悬念。《不老》是一部向生活和时代致敬的写实之书，它的叙事从不故弄玄虚，从一个豆浆摊开始讲起的故事，总是那么自然而然地在时间里流动。小说的结尾，也是平静而自然：张风毅结束牢狱生活要去青云岛、俞华南回到北京、孔燕妮去白鹭村创业。故事的核心人物在小说结束时各有所往，仍各自按照原有的轨迹在时间里流动。小说的结尾，没有标新立异的形式实验。可以说，这两部小说都显示出叙事的从容，而且从不以某种写作观去左右和去抽象化具体的日常生活，一切叙事都处在日常生活的原生地带，细心的读者从两人的叙事方式中，能准确感知两位作家创作风格的异同。

生死，以及爱与不老

生死和爱文学永恒的主题，《有生》和《不老》这两部作品对这些主题的把握各有侧重。《有生》倾力彰显了对生命本身的尊重和敬畏，侧重探讨了生之秘密，以及如何生、怎么活等一系列问题。而《不老》则侧重于个体情感和精神层面的探秘，以及个体在大时代中的命运沉浮。对两部小说的解读，都不能仅停留在故事本身和日常审美层面，它们都描写和叙述着盘根错节的时代生活，我们应该从具体的生活情境去理解小说人物丰富的人性维度。因为，小说是与读者深度相遇的方式，



也是读者借此连接并理解时代与世界的方式。

《有生》最动人的就是生命立场，主人公乔大梅被设定为一位超越生死，有着百岁高龄的接生婆。她把接生当作天职，“一生共接生了1.2万余人来到世间，被乡民奉为“祖奶”。作为一个生命的迎接者和守护者，每一个生命都有限性出场，但生者不能因为有死而失去勇敢拥抱和热爱生活的勇气。祖奶接生，是一种特殊的劳作，她为生者庆，将祝福带给每一个来到这个世间的生命，她也目睹了三任丈夫和九个孩子的相继死亡，一遍遍地承受着死亡带来的冲击与痛苦。对于一位母亲和妻子来说，这是常人难以承受的苦难，但在祖奶这里，对生的执着和对死亡的畏惧。作为妻子和母亲，她的爱和生命的韧性，与她在接生中内心对生命的信仰融贯在一起。虽然数次站在死亡边缘，但祖奶都被接生的强烈愿望给拉了回来，既然死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事，那就用生来消解对死亡的畏惧，用更多的接生来延续与完成这种消解。在祖奶这里，这种坚韧的生活态度素朴而真切，死亡的威胁也不能动摇它。这是小说要表达的对于“生”和“生命”本身的崇拜，也是作家本人借祖奶之口强调的“一个人心里有光，那光就会时刻指引他，不分昼夜，无论春秋”。

借助祖奶这个具有某种神性的人物，胡学文表达了对生命深沉的关怀，自始至终，作者都在用文字思考着“何以为生”的问题。只要还活着，就不能放弃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一个又一个坎，一场又一场难，绕不过去或拒绝了不，那就是活着必须支付的代价，“我接生过上万个孩子，没有一个是笑着出来的，恰恰是哭声证明了生命的诞生。”这是祖奶的生存哲学，更是作者对生命的认知。胡学文说《有生》是一本写“怎么生，如何活，如何走出人生困境”的书，“我写的是生和活，生是开端，活是过程。”胡学文将生与活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看待，没有生者之生，活就是不可能之事，生者在这个世界上如何活，才是生的意义最深刻的



小说结尾处，以2.8亿高价拍得的唐琴“长清”哑置于苍茫大雪中，把不同的人生故事一齐推向了无声的高潮。象征着尘世理想和欲望顶点的“长清”突然哑滞，一切的追逐仿佛在这—空寂时刻陷入混沌，也逐渐清明，每个人都将重新汇入生活的洪流中。

以纪实为脉络、以壶为载体的生活志

《广陵散》里的人琴相遇，如一场“渡劫”般的情感洗礼，相比之下，在《做壶》里见证一把紫砂壶诞生的过程，则如饮茶，如听评弹，从午后边边听，直到黄昏悠然而返，漫出另一种生活的滋味。郭平用“情”和“思”编织琴人命运，徐凤“技”和“艺”道出做壶精神。《广陵散》里，纷繁各异的琴名、通俗精彩的琴论点缀在生活场景中，铺展出人的遭遇和命运；《做壶》则聚焦于紫砂壶本身，生活感悟流动在—把壶的制作现场，平添了趣味与哲思。二者氛围各异，但最终都落脚于人和生活，揭示出传统艺术在今天与普通人或隐或显的关联，这样的诠释和述说，让现代读者对传统艺术，有了深度了解乃至理解的可能。

壶和琴，作为超越生活的艺术存在，其中奥秘，外人很难窥见。“让不懂壶的人能看懂做壶的奥秘，并且生出许多意趣和怀想；让懂壶的人读后也觉得受用，从中获得他们之前没有的视野和认知”，因为定下这样的写作初衷，作者徐凤捕捉住一把壶诞生中各种偶然和必然。每一个细小的工具，每一个匠人的习惯，都被放大和生动地

表达，这也是“有生”的内涵和思想所在。生是人的本能，人在这片大地上以怎样的方式活着，与每个人的具体选择相关，像情感朴素的祖奶这样以接生为活着的最高选择，显示出她人性中的光芒。读《有生》这部小说，祖奶的故事提示着我们，只有真正懂得了生之艰辛，才可能更好地理解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才可能有我们在世存在的坚韧。

“因为爱，所以不老”，这是《不老》腰封上的一句话，吸引了无数读者打开这部小说。作为女性作家，叶弥擅长写形形色色为“爱”而绽放的生命，以及因“爱”而进入独特事件中的女性。1970—1980年代，是中国社会生活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旧的生活观念和旧事物正在失去它原先的社会基础，新事物正在变革中初露端倪。在这种新旧更替的时代，《不老》中的孔燕妮是一位意识超前、思想开放的女性，也是一位某种程度上被“污名化”的女性，她偏离俗常、突破边界的行径和思想，时常受到周围人的指指点点。她一次次投入新的恋爱，目的是要释放心中的真诚与激情，是要追求一颗“不老”的内心。但从更深层次来看，实则表现出孔燕妮超前的自我觉醒，她在追求精神独立、在挣脱时代枷锁，她是用对自己身体和精神的尊重来获取自由与解放。

《不老》虽然有着“爱情小说”的外壳，但《不老》绝不是一部简单的爱情小说，它是一部融合了历史意识、时代精神，并带有女性主义立场的复合性文本。爱情，这个文学中的经典话题，它不只是出现在词典中，从日常生活来谈，爱情总是具体生存境遇中的话题，它必然刻写上时代的特殊印记。在《不老》这部小说中，爱情被事件化了，而且这事件中还蕴含着生活观的冲突和改变，这部小说，也因这爱情的事件化而抵达了人性的深度。叶弥也坦言：“我想用孔燕妮这个虚构的人来紧跟时代，不断审视自己的精神世界，并以此来保持精神上的不老。”可以说，《不老》也是一部我写给自己的精神之书。“因爱而不老”，尽管爱是这个世界上最难之事，尽管爱这个词落实到具体生活中去阐释，但“因爱而不老”仍是一种信念，甚至是一种个人认领的“宗教”。在这本书里，我想这也应该是作家叶弥及所有相信爱之力量的人共同的美好愿望。

“痴情”的中国女人

《有生》中塑造了许多乡村里的痴情人物，最著名的就是宁愿不吃饭也要种花，对花极度痴迷的大龄剩女“如花”。在闭塞落后的乡村，如花与周围人格格不入的爱好和行为，让她不断遭受来自母亲和周围邻居对她单身状态的讥讽、对她爱好的嘲笑。虽然也会受伤，但她却没有因此而改变，依然尊重自己内心的法则，我行我素。直到后来遇见能欣赏她、理解她的爱好的丈夫钱玉，婚后他们二人一起在坟包山上种花，在外人看来“夫妻二人都不太正常”。如花的“痴”不仅体现在种花上，丈夫钱玉因为煤矿塌陷离世后，她悲痛欲绝，

记叙出来，同时与常见的生活场景高度融合，可以说极为费笔和费心。徐凤具有散文家的敏感和诗意，“一把好壶，壶盖旋转时，口子是没有一点声音的，像轻风拂过河面。涟漪荡起时，风是贴着水面走的。如果你把它放在耳边，再度旋转的时候，你会听到若有似无的回旋之声，那是声音吗？再旋转，却一点点也听不到了。原来，是你自己的耳朵营造的一种假设的声音”。这样的描述和想象把读者带入壶的世界，也是传统的世界、自然的天地，壶似乎不再是一种器具，而是有了自然生命，由此通过对一把壶的凝视和想象，去激活古典灵韵在现代的重生。从这一层写作宗旨来看，《做壶》最想达到的，是以纪实为脉络，但不囿于纯粹的纪实，最终形成一部以紫砂壶为载体的生活志、生命志。

特别有意思的是，《做壶》和《广陵散》中，都存在着一位传奇人物，他们是作者创作的引子和灵感来源。《做壶》里“茄段壶”的发明者、“布衣壶宗”顾景舟（1915—1996）既代表了传统艺人的精神，如晨课、传统工具、尊师重道、天人合一，更给人亲切的生活、生命气息，顾氏的徒弟葛陶中认为，师父每次在讲古人的时候，“实际把自己也摆进去了，余下的故事，是他自己在续写”，他的讲述，“是一种接通——非但连接到古时，也让你浮想联翩到未来”。顾景舟有坚守，也有未来意识，更有超越个人技艺的平常心，他把一把壶时倾注身心，壶等成了，则让它归入市井生活，“成为一把实实在在的泡茶工具。柴米油盐酱醋茶，他甚至愿



传统的起止，是生活

——郭平《广陵散》、徐凤《做壶》对读 □项雷达

子弟的强韧，担负着父母的精神痛苦和无助；在爱情中为妻子毫无保留地奉献一切；为朋友出头弄瞎自己的左眼；最后妻离子散，在孤独的异乡死去。小说里，徐大可用极其生动的语言、雷厉风行的举止、镇定自若的行动，努力让他的朋友相信生活给予人的巨大、无穷的力量，正如他吹奏的唢呐，热烈热闹，将人间的喜怒哀乐全都敞亮出来，“这个世界需要唢呐，需要狂风和旷野”。即使妻子再嫁，朋友失散，身边再无一人，他也不愿沉浸在个人的悲伤中，“闭上眼，他觉得此刻他是有三只眼的，他可以用第三只眼看到世上所有的人，他们彼此彼此，每个人都一样，绝无例外”。

两个性情迥异的主人公在小说中不断地交流着对艺术学习、对生活与未来、对身边人和事的看法，与其说他们用信念和理想鼓励着彼此前行，不如说是他们那真挚深厚如高山流水的友情让二人消泯了孤独，永葆生活的信心。

小说不止于对“生活”的表层探讨，更深入富商、名门子弟、手艺人、歌手等各种各样的人群中，他们的言谈形貌、心态处境都让人印象深刻：严重作为收藏旧琴的富商，既有商人的精明盘算，也用财富维护着他所规划的古琴事业；名琴家之后的唐遇川，以倒卖古琴为生，成为不折不扣的生意人；刘进—是制琴仿古的古琴卖家，却废弃无数好料只为贴近唐琴“长清”的音色……各人对古琴、生活均有不拘一格的见解，生动真实地呈现世间百态。尤令人感慨的是，周明孤高自守的师父陆近春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老朽和无为，对—生与琴作伴的选择产生了自我怀疑：“有的时候，人们往一个地方走，不是越走越近而是相反，有可能我们会走到其他地方去。琴离我，我离琴，感觉很远。说到底我懂琴吗？真的懂琴吗？未必。”陆近春和周明的师徒隔阂在小说中既微妙又磊落，正如生活的复杂和简单本是一体两面，没有人是看破和出尘的。看得出，作者总是让他笔下的人物尤其是他偏爱的人物，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生命思索中，而“未完成”恰是属于人的最大的真实。

直到钱玉托梦说自己变成了乌鸦，她内心才重新燃起生的希望，有了精神寄托后，她每天都到山上喂食乌鸦。但后来她又再次陷入悲痛之中，因为乌鸦丈夫被村人毛根射杀，如花对此不依不饶，甚至从村里闹到了镇上，她坚持要让毛根伏法。乔石头买下坟包山后，要花钱置换如花和钱玉种过的土地，但无论谁登门劝说，如花都不答应。

《有生》中像如花这样痴情又可爱的女性有很多，比如祖奶也是其中之一，女儿白杏夭折后，她认为女儿化作蝴蝶飞走了，而且是蝶王；与祖奶性情极为相似的喜鹊，她从少女时期就能理解成群结队的“喜鹊”们的语言，并与它们心意相通；还有能做到与猪极为亲密的宋慧，大众一向将猪视为蠢物、脏物，但是宋慧不呆，她养猪时毫不嫌弃地搂着猪脖子，比对自己还亲一些，她认为猪就像朋友一样，能给人安慰。这种种执念、痴情、癫狂，看似是精神病态的一种，但是仔细一想却也充满诗意，因天真、朴素单纯、浪漫而动人。

人一旦有了情痴后，就会有念想和追求，并由此驱动个人生活进入情感的纵深状态。《不老》中的孔燕妮也是一个痴情之人，她不断恋爱，一次又一次为所爱之人献出真情。孔燕妮活得离经叛道又坚守自我，她毫不在意周围人的意见，不断追求精神的独立，她近乎论道一样与周围人谈论时代与当下生活、谈论理想与追求。其实，孔燕妮身上所承续的，也是自其祖母高大进、母亲谢小达以来几代女性身上负载的女性自我解放史。谢小达是一个老革命，当过革委会主任，她总是对现实种种不太满意，并直言不讳，并因此得罪了很多人，还受到一些嘲笑。她和丈夫孔朝山离婚后，与拖家带口甚至还带着前妻的老伴结合，虽然日子过得鸡飞狗跳，但仍然在关注着时代的点滴变化，时刻想着“要为人民做点好事”。

由痴情到癫狂，小说故事由生活中的事故而事件化，叙述着貌似精神病人的生活，其实，这是对生活中那些偏见和习见知识的抵制。这两部小说中都隐含着与常态相左的逻辑，太过正常的人即踏上这条道路也走不远，更不会让这条道路开阔起来。《不老》中，孔燕妮的父亲孔朝山是省城某医院的精神科医生，母亲谢小达因现实的种种不如意和撞见丈夫老仲的出轨现场后，死前的精神已呈疯癫之状；张风毅的姐姐张柔和后来也因精神病发作被送到孔朝山那里就医，孔燕妮的恋人俞华南本身就是精神分裂患者，孔燕妮自己多次被周围人视为“精神病”。人们在生活中不能接受如此这般的人物，但如果我们将精神病患当作某种隐喻和思考内容，也许能更恰当地理解这两部小说的深意。

小说应该如何表现时代，又如何抵达现实？这一直是作家们思考并追问的话题，从《有生》和《不老》两部小说中，我觉得应该能找到答案之一：写出时代变化下中国人的感情世界，写出痴情与“疯狂”背后的平常心。

（作者系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编辑、新媒体事业部副主任）